

漸進社會工程的象徵：

中國當代小說城鄉對立主題的變奏

◎ 張懿紅

城鄉對立是從傳統農業社會轉向現代工業社會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必然發生的社會現象，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意味著現代化的完成。根據世界各國現代化的經驗，要實現工業化、城市化這些現代化的基本目標，就不能不先從農村積累大量資本，因此現代化總是伴隨著對農村的剝削乃至於掠奪。而且要把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業社會改造為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工業社會，就必然要改造傳統農業。這就是說，在把小土地佔有制改造為適合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土地佔有制的過程中改變農業的生產組織和生產方式，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改造為適應大工業發展需要的、主要面向市場經濟的規模化農業，同時改進農業生產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在這個過程中，把傳統的農民改造成為現代農民，使農民伴隨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而變革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等。這一改造農業的龐大社會工程自然是以城鄉對立為出發點開始其漸進式的解決矛盾之路。建國後至改革前，中國的基本經濟格局是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的二元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也是典型的二元結構，即城市-市民、農村-農民，除考大學、當兵能使極少數農民進入城市，農民被長期隔離在城門之外。城鄉分割大大延緩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也造成城鄉差別背景下的社會身份等級及其階級仇恨。改革開放後，農民以極大的創造性參與現代化歷史進程，「民工潮」、鄉鎮企業、小城鎮建設等新生事物正在突破傳統戶籍制度，舊的城鄉分割、區域封閉的社會經濟管理體制，以及同質的、超穩定的傳統農村社會結構。但總體說來，中國依然處於從傳統的小農經濟向工商業為主導的現代經濟轉移過程之中，這個過程還遠沒有完成。從農業向非農產業（工商業）的轉移，似乎有兩種實現形式：就地轉移（如鄉鎮企業、異地打工等）和離地轉移（家庭住所、經濟收入、生活重心全部轉入城鎮）。應當說後者有利於推動土地規模經營和城市化過程，應當受到政策的鼓勵。但這意味著大量農業人口轉移到城鎮，而城市經濟增長的速度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這樣，生活價值取向已經城市化了的一批農村青年構成了一個十分特殊而龐大的社會階層，他們的社會身份依然是「農民」，但他們再也不願過父輩們那種廝守於土地的貧困生活，準備不惜一切代價進入城市。然而城市卻難以滿足他們安家立業的正常要求，他們不得不走的是一條比城市人艱難百倍的求生與發展之路。這一流動於城鄉之間、找不到生活位置的青年男女內心所積壓的怨恨與失望實在是中國大轉型時代一股強勁的社會情緒，值得關注與研究，因為經濟基礎並非直接決定上層建築，而是通過社會心理（社會情緒是社會心理的核心內容）的仲介環節而決定上層建築，尤其是上層建築中的意識形態部分。這就引出當代小說城鄉對立主題的一個問題：進城——征服女人的菲勒斯能指。

實際上，在國家意識形態以絕對優勢籠罩精神空間及其資訊傳達管道的時候，城鄉分割造成的階級差別和農民的進城欲望就已經通過迂回的方式在文學寫作中得到隱性表達，當代文學

史上兩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康濯的《春種秋收》和柳青的《創業史》都曾涉及這一問題。在他們寫作的時代（50-60年代），中國社會生活領域按照國民經濟建設劃分為工業和農業，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針的根本目的是支援工業化，使國家得到大量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商品糧食及其他農產品。這條犧牲農民利益的現代化之路必須通過修辭手法得到農民的支持，那就是所謂共同富裕的許諾：只有合作化才能一步一步地發展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業的產量，才能使所有的農民真正脫離貧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來。但是，工業與農業所對應的現實生活領域是城市與農村，兩者的經濟文化環境及其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生活水準的差距是顯在的，是不能用黨的總路線總任務等政治宣傳來抹平的，這就是為甚麼農村青年進城的強勁潮流始終湧動衝擊著社會主義建設規劃。我感興趣的是文學如何在這種現實與宣傳之間幫助意識形態成功突圍，這才是文學作為社會象徵性行為的政治功能。相信這樣一種論點是經得住時間和實踐檢驗的，那就是：一切事物都是社會的和歷史的，事實上，一切事物說到底都是政治的。因此，我們可以認同美國當代批評理論家詹姆遜的大膽假設：政治視角是一切閱讀和一切闡釋的絕對視域。

首先我們要考察的是兩位作家的語義世界。在同類農村題材小說中農村都佔據敘事中心位置，但城市也是作為副線或作為不在場的參照物而被納入整體結構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城市與農村是作家感知差異，使我國國民經濟建設這一整體世界成形的兩個物件詞項，二者之間的關係具有雙重特性：相似性與相異性，既是合取又是析取。二者之間關係的存在是意義產生的必要的先決條件。毫無疑問，城市與農村的意義統一於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大的政治背景，而它們在語義軸上的對立是多方面的：地域、生存環境、生活條件和水準、城市人與農村人的不同權力和利益等等。就城市這個物件詞項而言，它的意義成分又可以分解為兩個相反義素的銜接：社會主義工業建設與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及其腐朽墮落思想（主要是個人主義、享樂思想）。相對應的，農村這個物件詞項也可以分解為兩個相反義素的銜接：社會主義農業建設（合作化）和農民的私有觀念及其小農生活理想（個體發家致富）。如果用格雷馬斯符號學矩形表示，可以清楚地辨識各個人物的義素合成。情態軸1當然是梁生寶代表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情態軸2自然是嚮往進城享樂的考工廠的農村少女們。中性軸上是梁三老漢等被艱難改造的傳統農民，複合軸並非小說正面表現的範圍，不像杜鵬程《在和平的日子裏》和60年代的話劇《年青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那樣，因此付諸闕如。同一結構稍加變化的結構運算式是兩類概念值的矛盾對應關係：工業與小農意識的矛盾，對應於資產階級思想與合作化的矛盾。這是一個饒有趣味的意義結構運算式，它說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時代是一個典型的「文化革命」的時刻，即不同生產方式共存於同一社會構形，它們之間的矛盾成為政治、社會和歷史生活的核心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刻，舊政權的價值、話語、習慣和日常生活空間都被系統消滅，代之以新的價值體系、概念、習慣和生活方式。工業與小農意識的矛盾實際上是兩種並存的生產方式的矛盾，而個人享樂思想與合作化的矛盾也是同一性質。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所反對的兩種思想雖然同屬於私有觀念，但它們顯然分屬不同的階級意識，儘管私有觀念及其小農生活理想在當時被認為是農村的資產階級思想。小農經濟模式不適應社會化大生產，但對生產關係的強制性社會主義改造並不能超越生產力發展水準，使農民真正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只能以犧牲農民利益為代價。如此造成的城鄉貧富差距自然會啟動農村劣勢群體的力必多衝動，把他們的欲望導向不僅尚未消滅、而且還在新環境中有所滋長的城市沒落階級的價值觀念。

合作化是康濯和柳青的敘事主題，但城鄉對立的主題卻從一體化和諧社會景觀的表面成功偷渡，洩露了不同符號系統所發放資訊之間的限定性矛盾，它們構成「形式的意識形態」¹，使文本可以被重構為不同生產方式的符號系統運動的力的場。康濯的《春種秋收》寫於1954

年，一般認為它是把勞動和愛情結合起來歌頌農業合作化中湧現的新人新事。參照馬烽寫於1954年的《韓梅梅》，康濯的寫作策略之高明才能顯影出來。《韓梅梅》是針對農村高小畢業生不安心農業生產的現象，及時配合對他們進行勞動教育的政治任務而創作的，發表後曾在廣大青年群眾中引起熱烈的反應，發揮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其主題是顯豁的，構思也單純明瞭，開頭結尾的敘述者充當韓梅梅信件的引號，敘事主體部分是韓梅梅的四封信。主題通過韓梅梅主動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成為養豬能手的先進事蹟就得到充分的闡釋，另外還加上同學張偉挑肥揀瘦看不起勞動的落後思想作為對照補充。這樣的意義傳達是明確完整的，但顯然缺乏吸引人的藝術性。《春種秋收》就迥然不同了，且不說它把描寫敘述的多種手法穿插結合，製造波瀾起伏搖曳多姿的敘事效果。更重要的是，它還運用了一個百試不爽的小說元素來運載意識形態，那就是愛情。應當說，康濯對玉翠心理和行動的描寫是現實主義的，她想通過婚姻走進城市，這是農村青年女性實現進城夢的捷徑。然而，這樣一位相貌出眾的女性卻在城市人那裏屢屢碰壁，她所遭遇的城市男人大都是缺乏性魅力又無法溝通的；至於她自己看得上的團書記，人家又嫌她不安心農村，思想不好。這樣，美麗的農村姑娘看來就只能轉變思想選擇嫁個農村青年了。當然，接下來的敘事就應該交割給革命浪漫主義的喜劇原則了，這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組成部分。玉翠和農村優秀青年、科技能手周昌林戲劇性的情感發展把留在農村、獲得愛情與幸福生活完美統一，順理成章地完成了歌頌合作化的主題敘事。在對這樁婚姻的敘述中我們經常聽得到喧鬧的笑聲，流溢著烏托邦欲望滿足營造出的幸福感。這是當時農民所能想像的最好結局：勞動、愛情、幸福（更直接地說是「富裕」），當然也是主導意識形態可資利用的文化資源。康濯的敘事策略以一出愛情喜劇撫平了城鄉差別和階級等級制的不公，把農村人安放在新的田園牧歌中，那才是他們獲得幸福的不變的位置。

《創業史》對城鄉對立主題採取暗渡陳倉的方法，愛情仍然是首選的載體。相對於一心撲在合作化事業上的梁生寶，徐改霞未免過於敏感多情。然而她進城的動機一開始就不同於那些被城市生活享受所吸引、蜂擁而上考工廠的農村閨女，她是在愛情受挫之後受代表主任郭振山的鼓動，懷著參加國家工業化的崇高思想想要離開農村的，最後又因為愛情無望，通過國家正常招工決絕而去。敘事邏輯導向這樣的想像：如果沒有郭振山對這樁婚姻的破壞，如果沒有連續的誤解，生寶和改霞本應該有一份美好的愛情，改霞根本用不著進城當工人。這樣，《創業史》典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敘事（嚴峻的階級鬥爭形勢）借助於傳奇小說中小人破壞的模式保持了意識形態平衡，改霞進城不再是一件值得歎羨的喜事，儘管對於大多數農村人來說事實恰恰相反，那一片考工廠的學生藍和黑頭發就是最雄辯的證據。此外，敘事還借助改霞寡母的孤寂進一步抵消了改霞進城的誘惑，用倫理親情抵擋外出尋找新生活的衝動，以家庭的名義讓農民安心留在農村。這樣，柳青合情合理、嚴絲合縫的情節發展就堵住了農民進城的正常管道，祛除了有關城市魅力的可能想像，浮在敘事流表面的是新富農郭振山的陰險、改霞的失望、改霞母親的悔恨，這些東西足以把城市推向情感認同的負面。

進入80年代，路遙為我們留下了關於城鄉對立主題的最沉痛最尖銳的思索和表達。寫於1981年的《人生》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寫於1985-1988年的百萬字長篇《平凡的世界》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兩部小說分別打上了清晰的時間印痕，但都擁有明確的主題表達，那就是堅定的進城步伐。為路遙帶來巨大成功的《人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轟動效應至少部分是因為它抓住了一股強勁的社會情緒，在城鄉差距相對以後要大得多的那個時代，這種社會情緒會表現得更激烈。這就是為甚麼《人生》是同類主題闡釋中最具有現實主義批判性的一部小說，它的感染力源於真實的生活描寫、豐滿的人物形象、充沛的思想感情等為經典現實主義贏得聲譽的文學代碼。二十多年後的讀者依然感受得到高加林的痛苦，因為他的憤懣直

指社會不公——同樣的或不同表現的社會不公現象今天還未消除，通過社會工程逐漸消除它們是人類永恆的理想。像《紅與黑》中的于連一樣，高加林也是在久遠的未來仍會喚起激情的人物，他的仇恨在1998年劉醒龍一篇並不成功但很有影響的小說《大樹還小》中激化到咬牙切齒的程度。後者批判的鋒芒指向80年代的知青神話，農民秦四爹因為跟女知青談戀愛入獄三年，而知青卻可以肆意讓農民女兒為他們流產再拋棄她們。二十多年後自命不凡的知青依然趾高氣揚地騎在農民脖子上，農民女兒因為貧困還得充當他們的玩物，這就是知青對救命恩人的報答，也是城市對農村的暴行。在《人生》的時代，路遙通過感人至深的藝術形象圓滿傳達這種社會情緒，不能不說是表現了超出常人的膽識。《人生》的語義世界不同於《春種秋收》、《創業史》，關於農村與城市的義素組不再把國家工農業建設事業放在個人現實生活及其觀念的對立面，農村與城市不同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差距凸現出來，農村人與城市人不同的階級意識變得分明起來。小說的語義域不再停留於意識形態宏大敘事堂皇話語的表皮，而集中於個人生活道路來把握深層的時代脈搏。分析起來，《人生》的意義結構運算式涉及四個義素：在城市語義軸上的兩個相反義素是個人前途／小市民意識，在農村語義軸上的兩個相反義素是貧困／道德，它們組成格雷馬斯的符號學矩形，這個義素系統（即意義的基本結構）生成擬人的結合——即敘事人物。在複合軸合成的是黃亞萍以及克南媽、亞萍父母等自私勢利的城市人，中性軸上合成的是小說中的理想女性巧珍，她是貧苦農村的精神化身，集真善美於一身，體現了路遙有關農村想像的烏托邦性質。縱向的情態軸是城鄉能量交換的可能途徑，高加林由貧困的農村進入城市，並夢想借婚姻走向更大的城市，是貧困與小市民意識的結合；至於道德與個人前途的結合則是那個一閃而過的高加林的叔父，但他的進城之路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情態軸1缺乏示範性的道德吸引力。在康濯、柳青的時代，進城的路被農村優秀女性的愛情渴望阻斷了，無論這愛情是獲得還是失去，農村都是作為男性魅力的能指磁心一樣吸引著追求幸福的女性，而對於農村男性，這種愛情獎賞似乎反倒無關緊要。於是農村以一種男性霸權主義的自高自大把貧困的自我變成了地上烏托邦，這正是意識形態敘事的意圖。《人生》轉換了進城主題的模式：追求城市文明生活、以個人前途為目標的男性拋棄純潔善良的農村女性，而以城市女性為愛情進攻物件和實現目標的助手。這也是男性敘事經常採用的敘事方略，但是更具批判性反省意識：在推動故事發展的交換機制中，女性是最常見的交換物。因為自從人類進入父系社會，女性就一直是男人的戰利品、獎賞、禮物和財富，所以征服城市首先從征服城市女性開始。開始，當男性開始以主動進攻的姿態追求現實的幸福生活的時候，女性就作為農村或城市的能指，分別成為被拋棄或征服的對象詞項，就像巧珍與黃亞萍，她們代表文化的對立和階級的對立。然而這樣的文化選擇是痛苦的，從熟悉適應的人文環境轉換到一個陌生多變的人文環境，很容易感受到敵意與挫折；而且由於進城的路遍佈人為阻力，它必然蘊含人性裂變的種種可能。因此，路遙文本中的城市被意指為無情的異在，而農村則是精神的支持、心靈的歸宿，是人獲得根基持存性的熱土。高加林的背叛受到道德的審判，因為他不僅背叛了巧珍，還背叛了農村背叛了故鄉背叛了傳統文化，這就是進城的代價。背叛當然要受到懲罰，不僅要丟掉城裏的飯碗，還要被城裏女人「真誠地」拋棄。這樣，在批判現實主義客觀冷靜的社會解剖刀下，來自沒落文明和弱勢群體的道德義憤和階級立場，就緩和了農村物質生活的貧困落後可能帶來的心理阻抗，而通過癡心女子負心漢這一傳統愛情故事的全新演繹贏得了廣泛的情感認同，成為常讀常新的審美經典。

三部長篇《平凡的世界》不同於《人生》的，是濃郁的春天的氣息——浪漫主義激情。它寫於農村改革初見成效的時刻，後來日漸嚴重的農村改革新問題（如重稅、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不明晰、政績工程、貪污腐敗等）尚未顯露，光明的前景展現在敢於進取的新一代農民面前。雖然外面的世界依然是設防的城市，但農民進城的路子畢竟寬闊了許多，洶湧的民工潮

正在衝擊城市的大門。這是一個正在發生迅速變化、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時刻，正是傳奇出現的歷史境遇：「至於傳奇，看來它最終定型的條件，即我們曾提到的其他前提所依賴的條件——世俗性的範疇，覺得像魔力似的善和惡的意識形態素，某種救贖的歷史性——似乎要在某個過渡的時刻出現，在這個過渡時刻，兩種迥然不同的生產方式或社會經濟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共存。它們的對抗性還沒有從社會階級鬥爭方面系統地表現出來，因此消除對抗可以通過某種懷舊的（或者不那麼經常地通過烏托邦的）和諧的方式投射出來。」²這種過渡時刻主要被感受為一種有機社會秩序的經驗，儘管它正處於被滲透、破壞和重組的過程之中。所以，強烈的主觀理想化衝動對於現實社會變化的拯救是《平凡的世界》的歷史性特徵：它使那個世界隱藏的夢幻得以顯現，對一個時代的理想和恐懼、尤其是不能在其他形式中得以表現的理想和恐懼提供一種特別精確的記錄，因而是神話層次上的模仿，是一個時代集體潛意識的形式。這一點使它像時髦本身一樣趨於衰落，在自己的時代投其所好，在另一個時代卻令人難以卒讀。同時這也意味著它總是富有啟示性的：讓我們暫時地、戲劇性地體驗過去了的陌生社會的獨特心理壓力，從而更瞭解自己時代的特點。

《平凡的世界》依然接續《人生》的主題表達，但按照當代英雄傳奇史詩的秩序改編了城市與農村的語義。對於孫少平來說城市不僅是獲得個人前途、文明生活的入場券，它還是承載未知嚮往的冒險之地，因此它既是信仰中的未來——人生理想，也是主動經受苦難消耗英雄主義激情的人間煉獄。農村雖然在改革中走上脫貧之路，但依然期待更大更全面的變化。它充滿活力的傳統道德（樂於助人、誠實不欺、堅忍不拔、溫暖親情等）是少平性魅力之所在，也是他走出困境的力量源泉，是他最終獲得成功的絕對因。但同時農村又是束縛他因而必須堅決跳脫的保守主義藩籬。這樣，分裂因素的邏輯結合就標示出歷史的「野性思維」（或詹姆遜所謂「政治無意識」）突圍式的解決方法。這一次城市不再是滋生小市民意識和生存特權的無情異在，它被英勇獻身的田潤葉、田曉霞變成了在苦難中成就未來的理想女性，她們是慷慨的贈與者，當英雄受到考驗、質詢、攻擊的時候為他提供無私的幫助。她們把城市合成形而上的追求或希冀的主題，蘊含傳奇式的世俗未來的拯救之路。在中性軸上的結合生成了農村改革新人少安，他暫時還滿足於就地發展非農產業的致富計劃，這是那個時代農村經濟發展的歷史局限。情態軸上農村與城市的相互蘊涵指示著進城的道路，少平以道德活力走向夢想，而保守與苦難總是結伴而行，是父輩們坎坷的人生經驗，也是對人生欠缺意義思索和進取精神的郝紅梅的生活教訓。與《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徹底重寫了由城市與農村組合而成的我們生存其間的世界景觀，城市冉冉升起，是少平西天取經的人生意義。農村依然是道德（活力）的源泉，發送迷人的男性魅力，為少平和少安搭起成功的橋樑，但卻不再誕生巧珍那樣的理想女性，因而永遠喪失了阿拉丁神燈賦予農村的精神力量。這樣，少平走向城市不再意味著對農村的背叛，而是朝聖教徒崇高的人生選擇，《平凡的世界》因此被演變為歷史與傳奇的奇特混合。

在《平凡的世界》中，兩種文類形式因素的矛盾是可以明白辨識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史詩性宏觀敘事格局和個人主義英雄傳奇的異質性存在，姑且稱之為「傳奇史詩」。它的整體結構是《創業史》式的，力求全景式反映1975-1985年近十年間中國城鄉社會生活的巨大歷史性變遷。因此對中國社會各階層人物都試圖點擊囊括，從而使有關縣、地、省級領導和各次要人物的詳細交待僅僅具備形式完整的意義，對敘事進程不構成任何必要性。另一缺陷是對史詩的意義提升沒能從敘事中自然流露，而在無限延宕中被放逐，沒有達到穿透歷史的預期效果。另一方面，傳奇敘述的異質性脫離現實原則，敞開感受其他歷史節奏、以超凡的烏托邦方式轉變固定現實的可能。脫掉史詩性敘事冠冕堂皇的禮服，出現在讀者視野中的是以少平為中心的人物運動的河流，一個在朝聖與愛情的旅途上瘋狂冒險、在苦難中體味人

生崇高感的當代英雄傳奇。文本是如何把少平製造成當代英雄的呢？首先是把基於城鄉差別的農民進城的欲望改寫為自我放逐，到外面去闖蕩世界的「青春的激情」。在城市當攬工漢的少平雖然掙扎在社會最底層，為幾個錢受盡折磨，但他卻不僅僅將此看作謀生活命的手段。「職業的高貴與低賤，不能說明一個人生活的價值。恰恰相反，他現在倒很『熱愛』自己的苦難。通過這一段血火般的洗禮，他相信，自己歷經千辛萬苦而釀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輕而易舉拿來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這種認識叫做『關於苦難的學說』

……」³這樣，農民——民工遭受的社會不公被堅定的信仰演化為忍辱負重的人生哲學，它的根生長於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的生存智慧中。然而少平主動承受甚至追隨苦難的強迫症更像是一種英雄主義的白日夢，它的幻想性質正是傳奇的功能——把人從禁忌和偏見中解放出來，釋放受抑制的潛意識，滿足隱藏的願望和夢想。這當然是路遙隱秘的敘事動力——它明白無誤地滲透在話語的每一個辭彙選擇與組合中，那種激昂誇飾的語調很像是十七年文學的英雄主義再現。可惜少平作為傳奇史詩中的英雄，其英雄性已失去外在神奇事蹟的支撐而呈現自我消解的趨勢。無論少平如何從勞動、從苦難中挖掘崇高的意義，他的人生搏鬥卻總是落腳在「進城」這一個人的現實生存目標上；而且他並沒有找到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有效途徑，他由攬工漢變成礦工純屬偶然——是希望他入贅的曹書記和愛著他的田曉霞幫忙活動下來的。因此敘述邏輯引出這樣的結論：僅僅依靠自己男性的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少平就必然獲得拯救，尤其是來自女性的幫助。這位雲遊城市尋求冒險的當代英雄為自己製造不應有的困難，以便在克服困難的過程中顯示騎士的英勇、聖徒的崇高。他向城市的進攻採取消極被動的方式，表現出偏愛溫情、退隱、田園詩的傳奇境界的潛意識衝動。他背對冷酷艱難的生存環境，退回書本世界、自我道德完善、理想愛情和溫馨的家庭生活，最後他的進城不過是實現了由城市向另一種鄉村的退卻——礦區是封閉起來的寧靜的樂園。然而他前途渺茫的個人奮鬥被女性的愛情飾以光環，使他的勝利如同古代騎士一樣同時在戰場（進城）和閨房（城市女性）兩個方向展開。顯然路遙是過於偏愛他的農村青年了，少平先後得到拐女子、田曉霞、金秀、惠英等女性的愛，其中兩位還是大學生。他的心態仿佛一位體驗生活的作家，在工地和井下都在讀文學書籍，還與田曉霞耍弄文人幽默，風雅地爬山、討論、看詩，對知識、藝術、美、情感懷有形而上的單純信念。這些在當時就已經難以支撐其英雄形象，而使他更像一位古代落難書生或公子，難以承擔救贖未來的重任，在今天急功近利、欲望氾濫的文學觀念面前就尤其顯得幼稚可笑了。《平凡的世界》可以說是流行於當代文學的英雄主義最後的曇花一現，宣告了英雄時代的結束和世俗時代的到來，緊接著它就要變成諷刺型滑稽小丑了。

就這樣，路遙用傳奇實現了對城市恐懼的克服，城市仿佛一位鍾情于窮書生的富家小姐，代表企望中的美、幸福和等待開啟的真理之門，城鄉差異通過愛情的欲望滿足而不著痕跡地彌合起來。沒有了《人生》尖銳的疼痛和憤懣，溫情的關愛包裹了少平的身心，喚起往昔伊甸園時代和每個人心中永存的夢幻。在禮崩樂壞的臨界點，路遙的個人英雄傳奇史詩試圖以傳統道德和愛情理想來實現農村對城市的征服，這樣的救贖是對於變革時代的抵制和整合，它是逃避現實的，同時也是富有啟發意義的。路遙本人明確和堅定的生活態度和人生理想不是讓讀者從他們自己的現實世界逃離，而毋寧說是以小說的理想世界為平凡的人生經驗提供一塊試金石。實際上，路遙的現實主義精神使他不可能對現實的社會局限視而不見，他筆下的愛情雖然超越社會地位懸殊等世俗價值，但並沒有開花結果，而最終演化為毀滅美的悲劇：田曉霞被洪水沖走，金秀則因為少平的毀容而被礦區女人惠英代替。然而這一切並沒有削弱傳奇的內在主題：對生命活力、自由、青春、愛情的讚美一直回蕩到《平凡的世界》的結尾，它們是沖決一切社會障礙的人性本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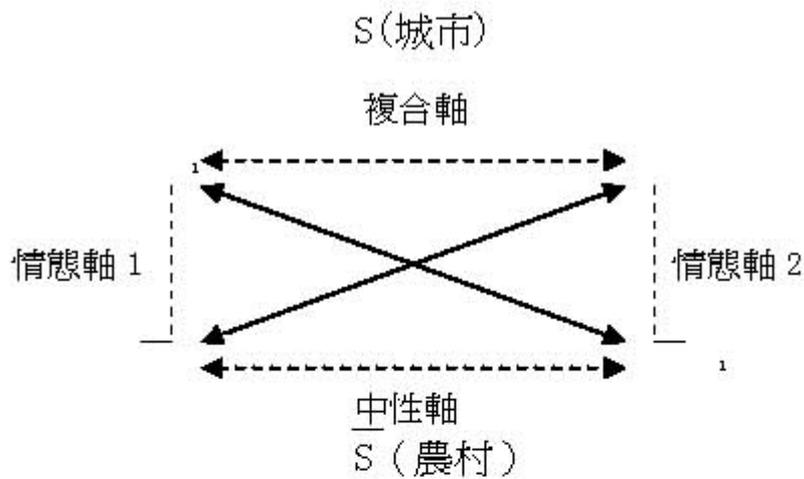
時間推進到2003年，河南作家李佩甫的小說《城的燈》再次把城鄉對立的社會不公攝入視域。這部長篇耗費巨大篇幅詳盡描寫部隊權力運作的過程和權力場鬥爭技巧，這是近年來暢銷書的一大賣點，當然與官場腐敗的社會現實息息相關，也正是大眾文化滿足欲望的活力所在。和這個時代的大部分作家一樣，李佩甫不再為了要在純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站隊而惶恐不安，他似乎並不準備在這部小說中建立歷史的功名，他所關注的是社會不公對人性的戕害，以及人性在特定文化生存環境下的異化。在他的語義世界裏，城市被分解為權力（欲望）和異化二元對立的義素組，而農村則可以分解為人道與傳統文化（主要是一種文化惰性）的對立。城市語義軸上合成的是所有那些處心積慮維護自身利益的都市人，他們蒼白的精神不言而喻，總激起作家強烈的諷刺欲望。農村的義素銜接合成的是既猥瑣自私又不乏人道同情、其民族劣根性有可能轉變為現代道德文明的農村人，他們在劉漢香的帶領下終於挺進城市。連接農村與城市的路徑是劉漢香與馮家昌弟兄們分別昭示的兩條情態軸，劉漢香堅持人道理想，帶領眾人獲得世俗欲望的對象——進城的權力，而馮家昌發揮農民的隱忍與機智，學習權力鬥爭的絕招，最終完成了整個家族的進城大遷移，同時也永遠地失去了自我。城鄉差別帶來的階級對立凸現出來，馮家昌的屈辱與仇恨揭示了城市與農村的雙重異化，問題的解決只能是社會工程學意義上的，其近期目標應當是把農村變成城市，如同劉漢香所做的那樣，而不是簡單地把農村人變成城市人，像馮家昌所做的那樣。新的歷史機遇為李佩甫的寫作創造了新的可能，《城的燈》延續《人生》的憤懣和對社會現狀的批判，但問題卻進一步發展，而不是被不可掌握的偶然切斷來演示道德訓誡的命運故事。黃亞萍嫁給了高加林，幫助後者借婚姻達到爬梯子的權力目標；巧珍從愛情折磨中站立起來，帶領村人種樹種花，把上樑村變成了月亮鎮——花鎮，以自己的心點亮了城的燈。不過，《城的燈》與《人生》的本質相同也是顯在的：現實利益依然屬於城市一維，而道德理想的非現實一維依然歸於農村，儘管劉漢香的神聖已經受到村人文化陋習的擦抹。這與其簡單歸結為作家的創造力匱乏，毋寧說是現實社會結構使然。對於一個趨於沒落的文明，它的信心大概只有從傳統道德源泉中汲取。

綜上所述，從《創業史》到《城的燈》，進城主題總要借助婚姻愛情才得以完成。上述小說的意義基本結構總是將性的魅力和道德活力賦予農村青年，他們的男性不僅吸引農村姑娘安心留在農村，還總能得到城市女性的青睞，這種性的吸引力是農民征服城市的意識形態素的夢幻表達。但也正因為性愛的朝三暮四本質，一方面城鄉矛盾有可能借助城市女性的愛慕和幫助而消解，另一方面城市女性也有可能在心血來潮的滿足之後拋棄或壓迫臣服於石榴裙下的農村男人。城市女性的複雜多變是處於劣勢的農村人對於城市的想像，它忽而是縱馬馳騁的廣闊天地，忽而又是冰冷堅硬的無情異在。構成城市景觀的另一半是城市男性，可惜他們總是缺乏性魅力，在文本中處於邊緣位置，而且最終總被農村青年奪去愛情。美麗溫柔剛強賢淑的農村女性使作家激情蕩漾，毫不吝惜溢美之詞。雖然她們總是被渴慕城市文明的農村男性無情拋棄，她們卻寧靜承受，保持人的高貴和尊嚴。她們寄託了人類對於正在逝去的鄉村文化依依不捨的眷戀之情，尤其是男性對於溫柔恭順忍讓的傳統婦德的懷戀。把這些小說還原到各自的歷史語境中作歷時性比較，漸進式社會工程的發展軌跡也就清晰顯現出來，我們可以看到農民進城的道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寬闊。在《創業史》時代，進城是農民的願望，卻受到社會的排斥、壓抑或禁止；到《人生》的時代，社會與個人的價值衝突凸現出來，高加林的進城受到社會的懲罰，卻喚起人類的道德同情與義憤。在《平凡的世界》中，少平已經使個人的正當欲求合乎社會許可的管道，但這種遇合帶有改變英雄命運的傳奇偶然性，不具備滿足集體願望的社會可行性。到了《城的燈》，社會許可的進城之路與農民的嚮往重合，劉漢香代表的情態軸¹已經能夠承載起人性的價值。從《創業史》到《城的燈》，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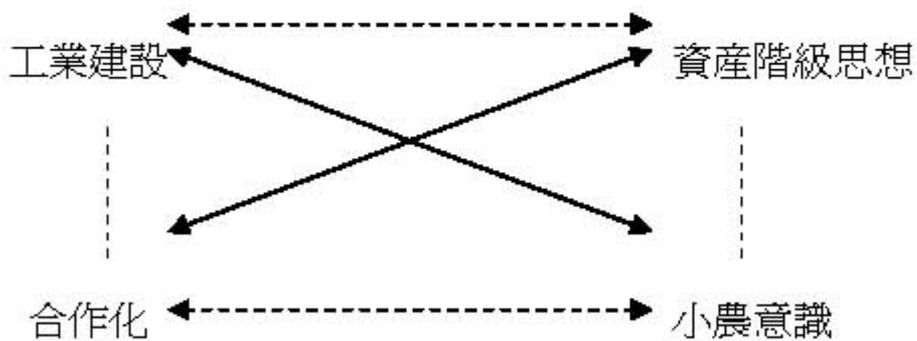
反對進城到譴責社會不公再到發現集體進城的金光大道，由異化的屈服到理想的實現，由不可知的個人命運轉折到制度化的集體轉變身份，中國社會改革工程的逐步演進在小說的虛擬空間中獲得了象徵性的表現，這種象徵性行為過程通過不同生產方式的並存、各種文類話語的沉澱、眾多意識形態素的碰撞而糅合為開放的歷史，我們可以期待它的光明前景。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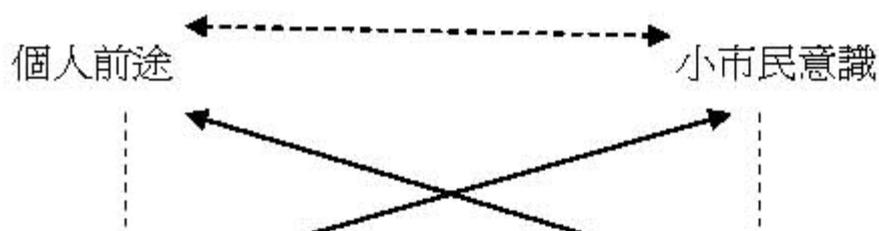
格雷馬斯符號學矩形（又稱「符號學方陣」）



《創業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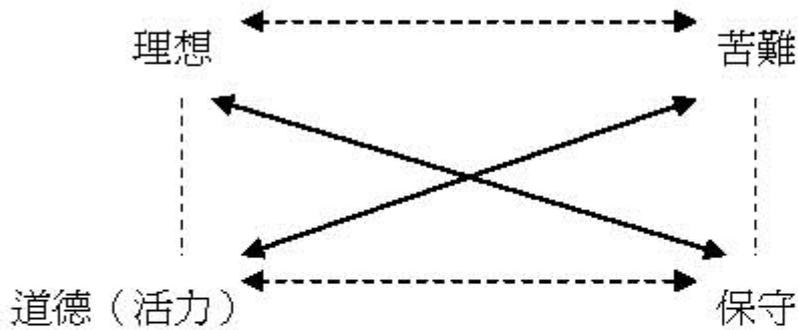


《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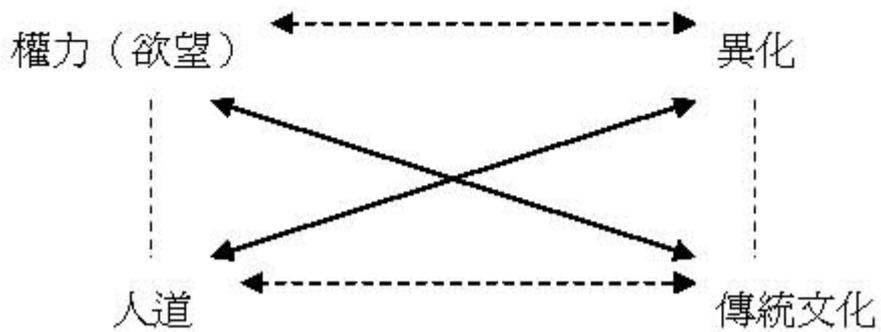




《平凡的世界》



《城的燈》



註釋

- 1、2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政治無意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86，第134頁。
- 3 路遙：《平凡的世界》，《路遙文集》第4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頁。

張懿紅 1968年生，現為蘭州大學現當代文學博士研究生，師從程金城導師，主攻農村題材小說，也從事小說創作。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三十六期（2005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